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范畴在国际研究层面的体现

李 滨 杨蓉荣

内容提要: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的主要概念范畴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在国际层面又是如何体现的?以此为对象的研究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作品的分析,提出在国际/世界层面,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经济基础就是国际分工及其社会表现,即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生产关系就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这种关系在政治上体现为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国际上层建筑就是以国际权力关系为后盾建立的国际政治与法律制度,全球/国际治理是其重要表现。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主流的哲学理论与政治理论,以及反映国际社会主导力量意志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存在抵制这一主流与反霸权的哲学、政治理论以及文学。文章还通过相关文本分析展现了国际意识形态是如何顺应各个时代的需要,反映不同时代各种世界政治力量利益诉求的特征。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 国际经济基础 国际上层建筑 国际意识形态

一 引言

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它在国际学术界虽然不是主流,但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体系。要提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的水平,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高水平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与原理来构建理论和分析国际现实。

而国际研究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特性就要看其研究是否应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目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不知如何把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应用于国际研究领域,如把一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范畴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应用到国际研究中。不少研究还存在空泛化、标签化和简单化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未能深刻理解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第二,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巨大差异造成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概念范畴的困难。马克思等一些经典作家,虽然在其作品中也提及国际问题,但没有提供现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分析范式。这是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国内社会。这就需要在国际研究中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其概念范畴加以创造性引申。

本文结合一些公认的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国际问题的文献,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范畴在国际研究领域的应用,以期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有所裨益。在正式讨论这一问题时,先做两点说明。

第一,马克思主义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但最为核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最具原创性的理论创造。恩格斯曾说,马克思一生有两个重大发现: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剩余价值理论。^①而后者正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是马克思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发现的特殊运动规律。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与核心,其他都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衍生而来,是对特定社会、特定时期的特定问题研究的成果与论断,不是其社会历史研究的范式性内容。因此,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与方法为基础,而不是以马克思在特定历史条件或对特定问题的论述为基础。正因为如此,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学者强调,他们宁愿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也不愿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之名。^②

第二,不是号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都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立足于生产(方式)来研究社会与历史的,脱离了生产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脱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就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属性。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沟通理论即是一例。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认为,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不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关键,因为这降低了交往的重要性;社会的再生产既取决于根据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在塑造物质世界上的集体成就,也取决于人们就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的程度。他还认为,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存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776页。

^②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 249.

基础性伦理,即人的交往沟通中有一种先验的“共同伦理基础”,并认为这是促进沟通成功的前提。^①因此,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应该被“沟通范式”所补充。人们在沟通领域的学习可以促进人的自由。这种先验的“沟通伦理”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同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伦理的产生是历史的产物,是与具体的生产方式密切联系的。当然,伦理有一定的历史传承,但如果脱离了生产范式来谈先验的“共同伦理”,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②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存在重大的区别。因此,有人曾经批评哈贝马斯把注意力从国家与阶级冲突转向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动机危机上。^③

基于上述说明,文中所指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应当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为基础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生产为基础的,脱离了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本文正是以此来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范畴在国际研究中的应用。

二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下的概念与范畴^④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以及相关的概念范畴本来应当是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内容已经变得陌生了,甚至被曲解了。有人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单纯的批判。凡是批判私有制、批判资本主义的似乎都是马克思主义,凡是宣扬公平与公有制以及工人阶级的似乎都是马克思主义。其实,如果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结合历史条件批判私有制,宣扬公有制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比如原始共产主义是公有制,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地位平等,但它的生产力低下,并不是马克思所肯定的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中的“流氓无产者”的否定与批判超过了资产阶级,^⑤这说明马克思并不是对工人阶级不加区别的。因此,在国际研究中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范畴之前,有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再普及。

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此处的“生产”就是下文所说的“生产的一般”,它与“生产方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每个社会中各种生产都是通过一定的生产组织方式进行的,抽象起来就是“生产的一般”;而且这是一种广义的生产,包括生产、流通、交换与分配。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

③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 206.

④ 范畴是人类思维成果高级形态中具有高度概括性、结构稳定的基本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些基本概念就属于此类。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作品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比较明确阐述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他一些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等,虽然带有补充的性质,但更主要的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研究和阐述一些具体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等问题,具有应用的性质。本文主要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并结合其他一些著作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生产出发,通过研究生产方式及其社会表现形式——生产关系——来研究社会的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并从中体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第一位需要是生存,没有生存就没有历史。要生存,首先要“吃喝住穿”。要解决“吃喝住穿”这一首要生存问题就要进行生产。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①因此,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为目标的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说:“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②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生产,是“生产一般”。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工艺学”上的特殊部门的生产,而是“生产一般”。^③

然而,生产的发展已经不是一种个人的生产,而是一种不断扩大的、人的分工协作的共同劳动,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化的生产。这种共同的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在人的这种分工协作的共同生产过程中,从社会表现形式上而言就要形成一种生产分工的模式,这就是生产方式。在这种分工模式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某种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生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社会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以研究生产为出发点必然导致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阶级分析。从阶级分析中将经济与政治相结合,使生产关系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经济与政治互动关系的纽带。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方式及其社会表现——生产关系——的研究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结合具体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的生产(生产方式)来进行研究的。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③ 同上书,第3页。

如马克思所说：“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①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应用就是研究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②因此，任何把生产（或生产方式）等同化的分析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只有从一般回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才认为“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③所以，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方法来研究社会与历史都是结合具体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来研究生产关系和政治经济。因此，相关的阶级分析、政治分析都不能固化，把所有历史条件下的阶级与政治等同化。

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所有生产等同化，把具体作为一般来强调，混淆了同历史阶段的生产与社会的性质，由此总结出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普适规律。一些教条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某个阶段的生产一般化，即把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等同化，也是犯了类似的错误。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的研究是以一般上升到具体为原则，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我们过去简单地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意即如此。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研究这种具体的生产方式，分析其中具体的、具有一定历史特征的生产关系，从而去研究具体的、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所以，在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个概念范畴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及其社会表现——生产关系）时，必须要有历史的具体性。

历史唯物主义第二个基本概念范畴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什么？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过一段总结性的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④这一概述可以简化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陈述中，上层建筑就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和相关的设施。有时，马克思也把相应的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③ 同上书，第18页。

④ 同上书，第32页。

的一部分。这里我们把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分开。

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三个重要的概念范畴。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谈到意识形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观念,而是与生产关系同政治、政治上层建筑相联系的那种思想观念。对此,马克思曾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统治阶级)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对这种意识形态的特征,马克思曾概括,统治阶级总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其意识形态也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②

同样,每种历史的统治阶级思想不能与统治阶级分割开来,应当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马克思曾举例说:“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③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这种意识形态是“历史中的思想”,而不是“思想中的思想”,不能脱离思想生产所处的历史环境与个人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最核心的概念范畴就是上述三个:生产方式及其社会表现形式,即经济基础;政治的与法律的制度总和构成的上层建筑;以及为生产方式与政治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和反抗这一切的抵抗性意识形态。

正是这三个核心概念范畴基础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历史唯物主义其他的概念范畴都是衍生于此,如阶级分析是从生产过程中不同地位的群体划分的。离开这三个概念范畴及其内在含义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些方面不存在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马克思主义之分。脱离了上述方面谈马克思主义就是标签式马克思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99页。

② 同上书,第100页。

③ 同上。

三 国际经济基础^①

国际社会不同于国内社会。它没有国内社会相对明确的生产方式、与此相关的上层建筑如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一个比国内社会分散得多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给后人留下这方面的具体范例供参考。如何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概念范畴应用于国际研究中是一个需要后人依据其中的概念与原理进行再创造的工作。但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许多作品中对国内社会的论述为此提供了线索。

在国际范围内,没有一种单一的生产方式、生产是分布在国家之间,而且各国的生产方式不尽相同。如何分析国际经济基础首先就是一个经典作家没有提供答案的问题,但他们在其著作中提及了相关线索。

国际生产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化生产,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化生产体系,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存在分工。存在分工就必然存在分工过程中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即民族内部的分工)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②而且,马、恩还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是公认的原理”。^③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交往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它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和国内生产中分工一样,有高低之分。这构成了一种分析国际经济基础的标准。

但是,由于各国的生产方式不尽相同,如何在国际层面分析各国不同生产方式形成的国际经济基础性质,如果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则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马克思在谈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同生产方式时曾说过:“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④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其他生产方式或遗迹,不是一种完全纯粹的资

^① 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广义的生产或者说生产方式。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③ 同上书,第68页。

^④ 同上书,第23页。

本主义国家。至于这些生产方式在一个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也就是说,占主导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他生产方式居于从属地位。

据此,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经济基础就有了一个参照。在世界范围内,哪一种生产方式处于国际分工的引领地位,这种国际经济就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导之下,形成一种国际分工的属性。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确定的。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整个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引领地位,这个体系就是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生产组织方式产生的生产力水平低于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这就是一些依附理论家所进行的分析。这种分析体现了阶级分析的观点,也是对国际生产关系的精辟分析。依附就是对国际生产关系最贴切的描述。正是这种依附的国际生产关系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经济利益的分配和权力分配处于从属状态。马克思曾经提到他那个时代国际分工形成的国际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关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

当代一些西方学者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国际经济基础时,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上述两种分析。依附理论依据的是第一种分析,即直接以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来分析国际经济关系。也就是说,在国际生产过程中的中心还是边缘地位,决定国家在国际生产关系中的位置。^③世界体系理论也采用了这种以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分析国际生产关系的方式。^④而另一些学者的分析则更为深入,他们采用了后一种分析。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罗伯特·考克斯在其《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著作中对国际经济基础的分析就采用了这种方式,他的结论是,目前世界存在12种从高到低的社会生产关系模式,在世界经济中由于资本主义性质,各种生产方式从低到高嫁接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

③ “依附理论”主要运用了普列维什的“中心—外围”观点,参见 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7, No.1, 1962; [阿根廷] 劳尔·普列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袁兴昌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④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pp. 215-216.

资本主义最高级的生产组织之中。^①在这两种分析中,不同国家的地位就在国际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了。尽管两种分析有所不同,但“中心—外围”的划分是共同的,这形成了最具典型意义的国际阶级分析。

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在世界经济中,国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建立以来是大体不变的。但也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具体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列宁是后一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他借助当时一些学者对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分析,指出民族垄断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结果,这就是其《帝国主义论》的主要内容。《帝国主义论》从民族垄断资本主义的变化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以及处于世界分工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的原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冷战结束后,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不同于列宁时代的世界经济,逐步形成了一种资本的世界融合,建立了一种“超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基础。^②但还是有一些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宁分析的世界经济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即使是冷战后,全球化时代世界融合资本的现象也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暂时现象。^③但是,不论哪种观点,其共同之处就是以国际分工分析国际经济基础。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国际分工体系是人类的社会分工生产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体现。生产关系不仅决定着利益分配,而且决定着不同地位的生产者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围绕着国际分工,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国际生产关系。谁主导着国际/全球生产体系,谁就能从国际生产过程(当今的跨国价值链)中获得更大的分配利益,谁就可能在国际生产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因此,有人直接认为,国际分工就是一种权力等级/过程。^④

四 国际上层建筑

国际上层建筑是一个比国际经济基础更为复杂的问题。上层建筑分为法律的和

^① Robert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2.

^② 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考克斯(Robert Cox)、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里(Antonio Negri)等,其观点参见William I. Robinson, "Beyond the History of Imperialism: Global Capitalism and Transnational State;"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哈维(David Harvey)、科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等,其观点参见[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Alex Callinicos, "Does Capitalism Need the State System?" in Alexander Anievas, ed., *Marxism and World Politics*, Routledge, 2010.

^④ Peter Gow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 Alexander Anievas, ed., *Marxism and World Politics*, p. 139.

政治的制度,它还包括相应机构如国家内部的军队、警察、监狱等执行制度的强制力量等。在国际范围内,一般政治学的上层建筑的概念范畴很难生搬硬套,如国家的政体形式就很难套用在国际层面。所以,国际政治研究与一般国内政治研究在概念使用上就存在不通融之处。因此,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政治学一般概念范畴应用于国际层面存在很大困难,而且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对国家的具体研究相对较少,对国际政体研究则更少。但是,即使这些少量论述也为我们研究国际层面的上层建筑提供了参照和依据。

马克思曾说,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个体利益与互相交往的个体的共同利益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一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①。恩格斯也曾论述过,“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法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在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②这都说明,国家的存在是维护某种分工所需要的秩序,以便分工的延续。因此,国家在维护秩序的过程中一般以社会的名义来维护秩序,既体现一般社会秩序的需要,又维护着当时主导阶级整体的而不是个体的利益需要。

这种维护整体利益的政治需要就要求一定的政治集中。这种政治的集中在形式上不一定是集中的政体,而是统一的政治、制度、法律与规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他们所在的时代由于财富的集中带来了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③这种集中的制度与规则必须与当时的生产组织方式相适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就资产阶级在破除封建生产关系后写道:“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④

在国际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国际政治结构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不存在和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家一样的政体 (polity) 及其严格对应的机构。但“无政府”并不代表没有国际/全球治理 (Governance), 只是这种治理参照国内的治理要松散与不正式得多。它的政体形式是无法用国内政体形式进行类比的。资本主义国际生产作为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必须要有相应的治理, 需要统一的规则、统一制度, 否则, 整个世界处于一种完全的无序状态, 国际生产也无法进行。因此, 它需要秩序、需要作为国际个体的国家遵守的规则和制度, 也需要保证秩序、规则和制度运行的强制力量。所以说, 国际上层建筑与国内上层建筑在形式上有时无法类比, 但是由国际生产关系形成的国际上层建筑是存在的。沃勒斯坦曾指出这种存在: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上层建筑是国家间体系, 在它之内, 或通过它, ‘主权国家’ 的政治结构被合法化并受到制约。‘主权’ 一词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主决策, 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自主, 并伴随着对这种自主的实际限制, 这种限制要么通过国家间体系明确的或潜在规则来实施, 要么通过国家间体系中其他国家的权力来实施。在国家间体系中, 没有一个国家——哪怕是在某个时间段内最强大的国家, 虽然它比其他国家享有大得多的自主——享有完全的自主。”^① 与国内政治不同的是, 这种规则的决定者是国家间体系中的霸权国家, 或者说是国际生产中的核心国家。因为, 正如沃勒斯坦所说, 国家间体系中的霸权国家, 既在国际商业和金融上拥有优势地位, 也在这个体系中的政治军事上拥有优势地位; 核心国家或霸权国家, 还通过对世界施加文化支配来谋求加强生产地位, 并合法化其在国家间体系中的地位。^②

考克斯在谈到国际上层建筑时, 也把生产关系与之相联系, 认为它是特定秩序的维系物。他指出, 世界秩序包括三个要件: 物质能力、制度和文化的。其中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考克斯认为, 制度是使特定秩序稳定化和永久化的手段。它主要由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决定, 往往 (或至少) 最初的内容与这种权力关系相一致, 是主导社会力量的“社会秩序的集体印象”的体现; 但最终制度会成为不同社会发展要求的战场, 竞争的制度反映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制度是意识和物质力量的具体综合, 但它反过来影响意识与物质力量的发展。制度的作用在于提供了处理冲突从而使暴力使用最小化的方法, 每一种世界秩序下都有一种以物质权力关系为后盾的强制力, 强者可以利用这一后盾在他们认为必要时击败弱者。但在霸权世界结构下, 强者不需要使用武力就可以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制度就是霸权战略的立足点; 非霸权结构往往是依靠权力关系的管理。因此, 制度可能是一种霸权的表达, 但不能等同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p. 213.

^② Ibid., p. 217.

于霸权。因为制度有时与物质力量关系不一致,滞后于意识形态的挑战。^①

由此看来,国际上层建筑是一种以国际权力结构为后盾的国际政治与法律制度及其运作。从近代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后,国际政治制度如相应的外交制度、安全制度(如集体安全、均势和军事联盟)等,国际法律制度如涉及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交往的各种国际法等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可以说,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制度涵盖了各个领域。这既是国际法研究的对象,也是国际组织涉及的内容。这些制度既有维护世界稳定,适应现代化生产与交往需要的成分,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需要。以知识产权领域为例,当今的知识产权国际制度既有保护创新的正当性,也赋予知识产权大国依赖这一制度获取过度租金的成分。这一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专利药品。药品的研制与生产本来是以消除与缓解人类的疾病为目的的。然而,由于WTO中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存在,没有研发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支付高额的专利许可费用来生产专利药品。虽然仿制药品价格仅是专利药品的零头,但由于TRIPs导致药品专利过度保护,仿制药品既生产受限更不能出口。昂贵的知识产权费用使得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一些患有重大疾病的病人无法获得维持生命的药品。

维护国际制度的强制力量不像国家有强力机构来执行。它的执行比国内松散得多,一般依靠国家的遵守承诺、国家间的相互报复来保证,但必要时会仰仗国际霸权力量,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国际霸权国通过制裁,最后是军事打击来维护制度的执行。

国际上层建筑并非一成不变,它也随着国际生产以及国际生产主导者的变化而变化。在19世纪的多数时段内,国际安全依赖于霸权国英国的均势政策和海军来维护;在20世纪则依赖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在国际经济领域,19世纪是通过英国与各国之间的协议,形成了一种自由放任的国际经济制度。在20世纪冷战期间,国际经济制度是在美国领导下通过签署一系列正式协议,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章程来确定的,体现的是“嵌入式自由主义”特征。冷战结束后,它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实际上已经修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实践确定的,它要求各国开放市场,放松管制,促进资本、商品自由流通,也由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制度。

^①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p. 218-220.

五 国际意识形态

在国际层面上,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生或盛行都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的、最经典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之一就是阐述意识形态不能脱离其社会与历史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批判当时一些德国哲学家把意识形态的产生与生产分开,把后者视为一种脱离物质生活条件的独立主观产物(唯心主义)。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不论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是否正确地反映现实,它们都来自与现实的交往。^① 存在决定意识,但形成的意识被流传下来,还会在适当时机被后人利用,为后来的现实需要服务,就像古罗马的一些意识与思想在中世纪被遗忘后又在后来作为“文艺复兴”精神重新发挥作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部分对这种现象做了精彩的描述。^② 因此,每个社会当时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存在基础就是生产及其生产关系。这种意识形态不一定完全是当时创造的,可能来自于“兼收并蓄”“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

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体系后,同样在国际层面上也存在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演化与发展相伴随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沃勒斯坦曾经写道:“世界经济从语言、宗教、意识形态意义上而言是一个文化的复合体,但这种复合体并不是随意的。它存在统治的世界观,也存在抵制这种统治的文化,虽然它们都带有各种变化的形式”。^③ 这种统治文化与抵制文化是由于世界存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在国际生产体系中存在主导者和依附者的缘故。主导的国际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显而易见的语言、宗教和道德形式呈现出来。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谋求施加某些思维与分析方式,尤其包括传导某些哲学与科学/社会科学方式呈现出来的。”^④

考克斯关于国际意识形态的阐述虽然复杂一些,但大体上与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阐述是一致的。他认为,国际意识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传统继承性的主观共识;另一类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群体的意识,它们都是决定人的行为的主要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

^② 同上书,第584-586页。

^③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p. 213.

^④ Ibid., p. 217.

识。后者主要是各种社会力量所持有的不同的“社会秩序的集体意象”(collective images of social order),这也是实践中产生的群体式意识,是关于主要的权力关系性质、合法性、正义与公共商品的含义等观点。它们是有机知识分子(为某个阶级代言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劳动的产物,因而这类意识彼此间具有对立性;它们之间不同观点的冲突是不同社会发展道路要求的表现,体现了未来历史结构的物质和制度的可能倾向。^①这就和沃勒斯坦一样,认为在世界范围既存在统治力量的意识形态,又存在抵制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社会基础在于存在不同的社会力量(生产关系)。下文就以一些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19世纪以来在西方流行的主流理论和文化来说明,它们都是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演变相伴随的意识形态。

近40年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特的建构主义)的出现都与现实的需要相关联。冷战产生了结构现实主义,^②为了维持美国霸权衰落下的西方合作产生了新自由制度主义,^③为了在冷战后顺应世界的改造而产生了建构主义。^④虽然这些理论的创立初衷可能并非如此,但客观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这三种理论都有一个核心的假设,在此基础上开始其系统性的理论历程。据此,“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从西方主流的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可以看到这个过程。西方理论的最基本的假定是(工具)理性。结构现实主义是从理性出发,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结构下,国家的安全与生存受权力结构的影响,在功利盘算下,国家的社会化行为导致对外行为追求或维持的相对优势,均势是维持国际稳定的最佳方式。^⑤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从理性出发,但认为国家是追求绝对收益的,但无政府状态使得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社会化行为)由于集体行动的困难导致了收益次优化,因此,通过制度来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促进国家的合作,实现理性的个体的功利追求,这也符合理性国家行为的功利动机。^⑥温特的建构主义也没有离开这种理性的假设,只是增加了社会建构

^①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p. 218-220.

^② 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是肯尼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它出版于1979年,正是冷战的高潮期。此时,美国处于守势,因此,这一现实主义也是一种防御现实主义。

^③ 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作是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诞生于1984年,正是所谓的美国衰落论盛行之时,美国霸权衰落后如何维持美国战后建立的国际制度以及维持西方的合作成为此书的主题。

^④ 此处的“建构主义”仅指温特的建构主义。因为建构主义名下的理论很多。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成型于20世纪90年代,正是新自由主义改造世界的上升期。

^⑤ [美]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⑥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性、互动对理性行为体的影响,强调通过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关系的改造。^①

这个理性的核心假设虽然带有强烈的实证主义色彩,都来自对现实的直观,但就像马克思批判的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一样,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个人的直观”,^②把理性作为一种恒定的东西,脱离了社会实践背景下对理性的界定,形成了人的“本质”。从西方古典政治自由主义到国际政治理论都与这种“本质”有着直接的联系。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假设了自利的个人,认为追逐私利的人会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为了稳定就必须有一种超越众生之上的“利维坦”,唯有如此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而在国家之间,也是由于国家理性成为“追求权力的本性”,要稳定与和平就必须通过权力制衡。^③《利维坦》可以说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先驱。以古典自由主义另一个流派为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理性”的个人在市场中按自己的(绝对/比较)优势参与分工,通过市场交换使个人与集体的福利都得到增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由此导致追求私利的个体在市场交换机制中实现利益的互补,从而达到彼此的和谐。自由市场制度同样在国家之间取得了这种效果,国家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通过交换实现理性的国家间利益的和谐,从而保障国际的和平与稳定。^④这被孟德斯鸠总结为“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和平”^⑤的结论。新自由制度主义从理性出发,认为追求绝对收益的国家应当维持既定的制度,因为这些制度可以保证国家的绝对收益,为此国家应当在既定的制度下合作。由人的“永恒本质”产生的理论为什么相互冲突,这不能不让人对这种理性产生困惑。

如果从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演化过程来观察,就会发现每个阶段都伴随着为世界秩序说项的理论。这正是世界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

按照卡尔·波拉尼的观点,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稳定运行,依靠的是四个支柱:均势、金本位制、自我管理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⑥这四个支柱都存在为其合理性说项的理论。自由主义国家来自“社会契约”论,国家是处于自然状态的自由个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3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页。

③ [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斯复、黎延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④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⑤ [法]查尔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页。

⑥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eacon Press, 1957, p. 3.

体的契约产物,是个体为了个体的生活便利、人身与财产安全形成的契约国家,因此,国家必须承担守夜人的角色。洛克的《政府论》就是这一理论的经典作品。通过均势来维护国际稳定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利维坦》。金本位及其自动调节机制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机制,它与自我管理的市场一样,其合理性的理论解释都是来自以上提到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盛行各种为资本主义世界性掠夺与殖民政策辩护的理论,如“白人使命论”“大国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各种极端民族主义。这些理论在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中被一一列举出来。^①在文学领域,当时颇负盛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吉卜林(Joseph Kipling),影响了众多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保罗·尼采和马克斯·韦伯的著述中可以看到充斥其中的民族主义。

二战结束后到冷战结束前,在“嵌入式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下,凯恩斯、熊彼特^②的著作之所以能获得巨大影响,主要是它们顺应了当时资本主义改良和国际协调的形势。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推崇,并使长期受到冷落的宣扬自由、反对国家控制的一些自由主义著作“复兴”了,如1974年长期在战后经济界受到冷落的冯·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44年所写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就强调经济自由是自由的基础,实现经济自由的基础就是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任何统制经济都是禁锢自由的非人道制度,会导致人类走向奴役之路。^③另一位被热炒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其思想主旨就是批判权威主义。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与《历史主义的贫困》(1944年)中,波普尔抨击历史主义,捍卫“开放社会”,即“自由与民主”的社会。^④在文学领域,作为新自由主义小说家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4年写成的《动物庄园》和1948年写成的《一九八四》被冷落多年后受到热捧。在这两部小说中,奥威尔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达到顶峰的可怕社会,以至于奥威尔式的政权成为专制政权,特别是苏联式体制的代名词。这些作品在冷战结束前后大为流行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放松国家管制,使国家重新向基本“守夜人”角度

^① 这种帝国主义文化的观点参见 John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1902), <https://www.questia.com/read/57170513/imperialism-a-study,chapter-2,3,4-of-Part-II>, 2019年3月11日访问。

^② 凯恩斯是国内学界熟知的学者,这里不再赘述。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就是当时顺应资本主义需要进行政治经济改良的理论作品,受到极大推崇。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③ 参见[英]弗雷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④ 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回归,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妨碍资本自由的环境。

“理论永远是为了某种目的,为了某些人的”。^① 为世界秩序与主流制度范式辩护的理论与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主义之后的作品(其中包括19世纪后期以来的作品),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而是借助“科学主义”的方法、较好的逻辑,利用苏联时期体制的问题,特别是运用了永恒不变的“人性”,比较精致地为现存秩序运行或改良服务。

结 语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生产方式作为分析起点的,它的最基本概念范畴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是通过生产方式展开的。这些概念范畴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要素。通过这些要素形成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后两者对前者具有反作用的理论逻辑。该逻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研究的特征。然而,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范畴在经典作家那儿主要是为研究国内社会之用,而国际研究是一个不同于国内社会政治研究的领域,如何把这些概念范畴应用于国际层面,要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原理以及经典作家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创造性地加以引申。

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个重要概念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在国内社会的研究中是以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基础的。在国际层面上,生产方式多元化使得国内社会研究国际生产方式复杂化。但借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主导与多元的关系观点,可以为研究国际经济基础提供线索。在国际分工中,不同国家的多种生产方式共存于一个国际分工生产体系中,但这些生产方式存在主从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普照之光”以及“特殊的以太”“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的意义。因此,国际分工以及其中占主导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国际分工属性成为国际经济基础。这种国际分工决定了国家以及各种生产方式在国际生产中的地位,并塑造了国际生产关系。

国际上层建筑在政体形式上不同于国内政治,而呈现出一种所谓“无政府”特点,并且没有世界层面的暴力机器。这种特点形成了国际层面的上层建筑与国内社会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然而,这并不代表在国际层面没有上层建筑。国际上层建筑虽然在

^①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207.

形式上来看,其政治权力结构呈现分散性,但它主要以国际/全球治理为特征。国际/全球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制度体系。它立足于国际生产分工体系,随着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通过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形成的国际制度就是国际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国际上层建筑不同于国内社会的另一面就是,维护国际法与规则更多依赖于霸权国及其联盟的暴力。

国际意识形态是一种维护/反抗现存世界秩序的文化。这种旨在为维护/反抗现存世界秩序的文化为某种经济范式、政治秩序提供了一种合理性说明。国际意识形态不仅以语言、宗教和道德等多种形式呈现出来,而且更突出地以某种哲学、科学/社会科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们的传播旨在施加某种思维与分析方式,为维持、改良或者反抗现存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做出合理性解释。国际意识形态有时是即时创造的,有时却是借助过去的理论与思想“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是时代需要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具体时代的生产对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般上升到具体”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范畴要与具体的社会生产组织相结合。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概念范畴体现的内容都是历史的。这种历史性来自于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的创造性,以及过去生产组织方式运行过程中的矛盾性,由此造成不同时代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具有差异性。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国际经济基础也必然呈现出历史的变化性。如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经济基础不同,也与冷战时期的国际经济基础不同,更与当今经济全球化不同。固化国际经济基础,不仅在理论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属性,而且也不能忠实地反映现实。国际上层建筑同样也是如此,不同时代的国际/全球治理呈现出时代性,不同时代的国际权力结构与霸权力量都是不同的。因为它与国际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样,国际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历史中的思想”,反映不同时代世界统治力量与反抗力量的时代关注,也反映国际生产关系的要求。

(作者简介:李滨,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特聘教授;杨蓉荣,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社会科学院无锡分院讲师。责任编辑:宋晓敏)